

智利與中共關係二十年

(一九七〇—一九九〇)

周麟

一、前言

智利共和國艾爾文(Patricio Aylwin Azocar)總統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偕夫人率五位部長、朝野國會議員多人、企業界人士及記者等龐大訪問團，抵北平作爲期五天之正式訪問，是爲智利歷來第一位應邀正式訪問中共之總統。彼等一行離中國大陸前夕(十一月十六日)，由艾氏與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代表雙方政府簽署「聯合公報」，在中共堅持要求下，於其中列入「重申智利政府承認北京政權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爲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智中(共)建交公報中含有此段文字)。

該消息經智國媒體披露後，引起多方議論。我國駐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亦應傳播媒體詢問，表達對該段「不必要」文字及中共趁機遂行「政治勒索」之不快。①十一月十九日智外交部代理部長瓦爾加(Edmundo Vargas Carreno)在記者會中主動宣稱：「艾總統簽署公報之舉僅意味智利過去二十二年來之對華政策未有任何更易，唯一之改變乃是與台灣之關係已大幅增進：吾等深盼維持並加強此種關係……」②一個與我國未具正式關係，而與中共維持正式大使級外交關係之國家，由其執行外交政策之主管主動作此官方宣示，似可演繹出智國外交政策之若干特質。

智利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馬克斯信徒社會黨阿燕德(Salvador Allende)總統所領導之聯合「人民陣線」(Unidad Popular)政府上台一個月後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成爲拉丁美洲(以下簡稱拉美)繼古巴後第二個承認中共的

註① El Mercurio, 18-Nov. 1992, Santiago (Stgo.)

註② Diario La Tercera, 19-Nov. 1992, Stgo. & El Mercurio 19-Nov. 1992, Stgo.

國家。阿燕德政府係西半球透過自由選舉產生之第一個左派政府，故深獲蘇聯讚賞，譽之為「拉美革命之楷模」。智國政府並與古巴維持極密切之關係。當時智利雖與中共意識形態相近，惟因「革命本質與手段」並不盡相同，故阿燕德執政三年期間，雙方關係並不熱絡，甚至「互不欣賞」。為何同在國際共產陣營中二要角會發展出此種冷淡之關係？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四軍^③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阿燕德舉槍自戕。軍政府成立，於是除阿燕德執政期間外，智利長久以來穩固之民主制度亦為之中斷近十七年。

智利軍政府在皮諾契特將軍 (Gen. Augusto Pinochet Ugarte) 領導下對內解散國會，禁止政黨活動；對外則高舉反共之大纛，宣佈與蘇聯及東歐國家斷交。中共初亦曾審慎評估與智利之關係，惟俟智利與蘇聯集團斷交確定後，決意與智利維持關係。結果一極左，一極右之二政權在冷戰方興未艾之際不但維持，甚且發展頗為密切之雙邊關係。其中之緣由更值得探討。

本文旨在探討智利於一九七〇至一九九〇年與中共建立及發展之關係，藉此評估智利外交政策之若干特質，以及中共與智利拓展關係之模式。

二、智利對外關係簡述

(一) 智利對外關係之制約性因素

一國之外交殊難無涉其所處之地理位置及具有之自然環境。智利以「全世界最狹長的國家」聞名，國土自北阿利卡市 (Arica) 至近南極之火地島 (Tierra De Fuego) 長達四千二百七十公里。海岸線長度超過一萬公里，土地面積七五六、六二六平方公里。此狹長地形雖非自其一八一〇年脫離西班牙獨立時即已具有，惟維持該疆域現狀實係智利外交及國防努力之終極目標。智利北與祕魯毗連，東北與玻利維亞為鄰。^④東邊以安地斯山脈崇山峻嶺與阿根廷為界，西鄰太平洋。另其在離大陸本土三千七百六十公里之南太平洋中擁有一島，其名「復活島」(Isla Pascua)。此外，智利因南鄰南極

註③ 智利國防武力中除陸海空三軍外，尚有為數二萬七千名警備軍 (Carabineros)，負責維護智利長達四千二百七十公里狹長國土之邊防及其它治安之任務。請參閱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London, 1989.*

註④ 一八三七年第一次智利與祕魯及玻利維亞邦聯戰爭前，智利國土長約為三千四百公里，該次戰爭後玻利維亞割地予智，後者國土向北推進二百餘公里。一八七九年智與祕魯戰爭再度爆發，四年後祕魯戰敗，秘割 Tarapaca 省，玻割 Antofagasta 省予智 (見註③)，智國土再延伸六百餘公里，成為目前疆界。

大陸，具地利之便，故自一九四〇年起主張擁有南極中一百二十五萬平方公里土地之主權。由上述之地理因素，可歸結出若干特質。一為擁有強大海軍之重要性。^⑤二為其推動海洋法及爭取二百海里專屬經濟海域努力之必要性。三為極為重視國際間對南極問題態度之發展。四為輒強調其與太平洋盆地沿岸國家之關係。

智利係礦產國家，智利與硝石曾合名智利硝石。硝酸鹽亦曾為出口大宗。人造硝石出現後，智利經濟曾受不小打擊，惟所幸銅礦取代其成為近代智利經濟之命脈，一九八九年銅礦產品仍占總出口百分之五十點四，其重要性可知。是故，銅不但成為智利國計民生之首要關注項目，亦與其對外關係之發展密切難分。此外，近年來智利擴大生產農林產品，水果及木材紙漿已漸成為主要出口項目。工業生產亦已漸萌芽。

智利總人口一千三百廿三萬餘人（一九九二年四月人口普查結果），其中西班牙後裔占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廿為歐洲德、南斯拉夫、法、瑞士、英國及義大利後裔，或混血者，土著僅占百分之五左右，基本上為一白人國家，為南美洲三個白人國之一（另為阿根廷及烏拉圭）。由於其係歐洲人後裔，在文化上深受歐洲影響。此外由於受自然環境阻隔，與鄰國交往頗受限制，故亦有若干人自視為「島國」而有亟盼與外界加強聯繫俾免自絕於世之心態。而其所尋覓交往之對象，自然是其祖先或父執所來自的歐洲。^⑥

另在智利人口因素上值得一提的是為智人雖多為西班牙後裔，惟其中巴斯克人（Vascos）眾多，為拉美僅見。巴斯克人為眾所公認西班牙人中最勤勉耐勞、復精明冷靜之族群。此可由智利歷史中總統、部長及各界領袖不斷出現巴斯克姓氏獲得證明。此外，智南土著阿勞卡諾人（Araucanos）驍勇善戰，自一五九八年摧毀比歐比歐河（Rio Biobio）以南所有西班牙人建立之城市後，終殖民時期未臣服西班牙王權，造成智利人「居安思危」之個性，當然亦造就智利軍隊藉不斷征戰而獲致之戰力，此或係智利立國以來戰無不勝之原因。^⑦

註⑤ 智利東邊以岩質之高峰與阿根廷為鄰，北部與秘玻交壤處多無垠之沙漠，均乃自然之屏障，南部極地嚴寒，若干航道冬季甚至冰封。其唯一之可能外來威脅當係來自太平洋。故自第一次智—秘玻戰爭後，智經努力已然成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之第一海權國家。有關智利宣稱其擁有南極主權之經過與發展見Sergio Villalobos et al. *Historia de Chile*, (Santiago: Ed. Universitaria, 1992), pp. 754~755.

註⑥ 智利獨立後，有感於西班牙殖民政府未重視當地教育，使得智利文化水準不高。為期迎頭趕上，當時社會菁英紛自歐延聘名師來智利任教，當時德、法學者頗多聯袂赴智。另若干英、法、美國航海業者，商人、技工及軍人等專業人士亦在智獨立後來智定居，加以一八四一年起執政之Manuel Balmes總統特重教育，廣建各級學校，終使智文化水準不斷提昇。一八六〇年代，德國數千移民移居智南，促使智歐關係益形密切，直至戰前，智青年赴國外留學之目的地仍多以歐洲，而非美國為主。此種「白人主導」之型態，一般領導階層亦予以維持。Sergio Villalobos y. Marta Finsterbusch, *Historia de mi País*, (Sigo.: Ed. Universitaria, 1991), pp. 127~130,另見註⑤，頁四三及四三八。

註⑦ John A. Crow, *Panorama de las America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0), p. 112 智利獨立以來與外國發生過三次戰爭，除與秘玻二國之戰已如前述，另於一八六〇年為聲援秘魯對抗西班牙擴張，與西宣戰，曾遭嚴重砲轟之沉重打擊，惟後仍稱勝。與阿勞卡諾人征戰經過見註⑤，頁一四三至一四八。

智利另一在拉美獨樹一幟者為其穩定之政治制度及具民主之傳統。此似與其重視歐洲文化內涵，堅守民主制度，崇尚法治精神有關。智利自獨立以來，除一八二〇年代因共和國初締，調適不良，致曾發生內戰。另於一九二四年，因國內政事不休，軍隊曾發動兵變外，始終堅守憲政傳統，當拉美其他國家政局動盪，擾攘不已之際，智利已在穩定中進步及發展。

(二) 智利外交史中之重要理念

1. 「美洲主義」(El Americanismo)

智利立國之初因受當時拉美革命先驅，如玻利華(Simon Bolivar)、聖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等人影響，主張「拉美國結」，共同攜手建立令他國重視及尊敬的國家。美洲主義雖亦有其他若干別名，^⑧惟基本上具若干特質；首先是「區域統合主義」(Integracionismo)，即主張拉美各國應藉由尊重彼此主權並加強貿易往來，以及追求共同對外政策。區域統合概念乃成為智利近代如傅瑞(Eduardo Frei Montalva)及阿燕德等政府外交政策之主要目標。^⑨其次為「團結一致抵禦外侮」。一八二三年美國門羅主義雖「提醒」歐洲列強莫再企圖干預美洲事務，惟在一八六〇年代，美國內戰方殷之際，西班牙一再以軍事力量干預拉美國家，終導致拉美之反彈。^⑩智利為協助祕魯對抗西班牙之挑釁，無端慘遭嚴重之損失，亦引起國內若干團體之反對，尤其十數年後智秘再啟戰端，更印證當時反對者抨擊智利政府之理由。^⑪惟無論如何，智利「拔刀相助」自亦在拉美建立起「捍衛大家庭」之良好形象。

2. 「國家主義」(El Nacionalismo)

一八三二年起開始主導智利國政之卜達賴(Diego Portales)部長堅信唯有建立強固之國家主義，方可能內求安定，外獲自由。因之主張智利應建立一支強大海軍作為捍衛及鞏固智利國防之海上長城，並應遠離南美大陸之爭端，尤其不應在本地從事冒險不當之作爲。惟認為智利應努力成為南美洲區域均勢之主軸。此種「現實權力政治」之實踐即是不允許南美洲出現任何足以威脅區域權力平衡之力量，因為該力量亦將威脅其安全。一八三七年智利與祕魯及玻利維亞間第一次太平洋戰爭即乃肇因於秘、玻建立聯盟意圖合併所致。^⑫一八七九年秘、玻再締密約，意圖聯合對付智利，智利復發動第二次太

註⑧ 有名 Hispanoamericanismo, Interamericanismo, Latinoamericanismo, 至「反帝國主義」(Antimperialismo)者。

註⑨ Walter Sánchez G., "Las Tendencias Sobresalientes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Chilena", en W. Sánchez G. y Teresa Pereira (ed.), *150 años de Política Exterior Chilena*, (Sigo.: Ed. Universitaria, 1977), pp. 379-382.

註⑩ 有關拉美國家獨立後西班牙對其抱持之態度請參閱周麟，「西班牙拉丁美洲政策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八年，頁十四至十八。

註⑪ 同註⑨，頁三八。

註⑫ 該戰爭經過詳見 Demetrio Boersner,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America Latina*, (Caracas: Ed. Nueva Sociedad, 1982), pp. 140-142.

平洋戰爭。該戰爭後智利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首霸之地位於焉確立。¹³此國家主義在智利助祕魯與西班牙作戰之後因智利人之心理轉變故尤顯突出。第二次太平洋戰爭後，此種理念更獲廣泛認定，因此智利對外態度漸由原美洲主義轉變為採取守勢、維持平衡之國家主義。智利外交學院教授西帕爾維達（Alberto Sepulveda）指出：「智利與祕魯、玻利維亞（第二次）之戰，確立我們外交之新內涵。」實可引證此種轉變。

3. 「法治主義」(Legalismo)

法治主義在國際政治而言，其定義應為「將對國際法之絕對尊重及遵守置於其他武力或權力考量之上」。智利對外關係所著重之法治主義的起源，應與法學家貝佑¹⁴主持智利外交三十年，奠立智利外交崇法之傳統有密切相關。此外，由於該主義強調國家平等及不干涉他國內政二原則，對拉美新興國家而言格外重要。對智利而言，其政治菁英有鑒於本世紀初美國逐漸加強對拉美進行干預，而拉美國家幾乎毫無對抗之能力，因之彼等認為強調法治主義將有助於減少美國對本地區之軍事或政治干預。另者，凸顯對國際法之尊重，有助維持與祕、玻兩次戰爭後彼此重劃領土疆界之現狀，故亦對其有利。¹⁵

智利因強調法治主義，而造就了大批國際法人才，其為擴大在拉美之影響力，也大力推動所謂的「新美洲國際法」(New American International Law)之建立。其次，其崇法之作為亦有助於其成為眾所信賴之調解者，一九一四年美、墨(西哥)戰後，智利成為南美ABC(阿根廷、巴西及智利)仲裁國之活躍成員。在國際聯盟時代，智利代表團亦利用強調前述國際法之原則，致力爭取其本身及拉美中小型國家之利益。¹⁶智利在此主義展露出最重要之特徵為「交付仲裁」。其將與祕魯邊界爭端交付美國仲裁；將與阿根廷之多次邊界糾葛交付英國女皇、教宗等仲裁，均屬明證。雖有部分人士反對智利政府因絕對尊重仲裁結果，而導致土地損失，惟智利政府似仍「不改其志」。由此可概見其「法治主義」之充分實踐。¹⁷

三、智利與中共早期之關係

智利與中共在一九七一年建立外交關係以前，基本上而言，雙方關係並不密切。而造成兩者關係疏遠之原因，除了距離

註¹³ 該次戰爭亦名「硝石戰爭」。事實上經濟的原因尤為突出。該戰爭後，祕魯深受打擊及創傷。玻利維亞則從此喪失出海口。此結果導致智利長久背負「擴張主義者」之名，其對外關係長期亦深受此編絆。詳見註¹²，頁一八〇至一八一。

註¹⁴ 一七八一年貝佑誕生於今日委內瑞拉之卡拉卡斯(Caracas)，及長留學英國期間曾任拉美國父玻利華之助理。敏而好學，嗣應邀獻身智利文化及外交，曾任智利大學首任校長，著有智利民法、國際法原理，以及西班牙文法法等無數佳作，該文法乃全球迄今公認最佳之西文文法巨著。終其一生，為法學家、哲學家、詩人及作家。智利外交學院以之命名，表彰對渠尊崇。

註¹⁵ Emilio Meneses, "Coping with Decline Chile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Thesis of Ph. D. Oxford Univ. 1988, pp. 113~120.

註¹⁶ 註¹⁵，頁一七六及一八一；另現今智外交官中獲律師資格者比例甚高，亦或與其崇法有關。

註¹⁷ 有關智利喪失數十萬平方公里之土地，詳見註⁹，頁三九。

遙遠，彼此瞭解有限，一九七〇年代以前亦缺乏政治及戰略利害，甚至經濟利益亦少。另者中華民國與智利維持長久之外交關係，及與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維持正式關係，當係智利與北平政權未能建立及發展密切關係之主因。¹⁸此外，美國以其在拉美之巨大影響力，一九七〇年代前其對中共之態度當亦係中共在拉美未能涉足之原因。蘇聯在拉美之勢力亦有相當關聯。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共與蘇聯齟齬漸深，亟思拓展其與第三世界國家（當時名稱應為亞非拉國家）之關係，拉美遂成爲其拉攏之對象。一九六〇年中共對拉美發動「文化外交」（*diplomacia cultural*），除在智利及其他拉美國家設立「友好協會」外，並加強對當地作西葡語廣播。「新華社」亦爲其達成目的之跳板。「由新華社到外交關係的建立」形成中共該時期在拉美之外交特色。「新華社」角色之多重，非一般通訊社所可比擬。¹⁹

文化關係既經建立，中共隨即以建立「商辦處」作爲其滲透當地政府之根據地。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派南漢辰率團訪智利，並趁機設立商務代表團。其後藉與智利已有相當貿易交流爲由，獲左翼份子協助並獲允居留。一九六四年傳瑞政府上台，採容共偏左政策，頓使中共商務團之地位更形穩固。²⁰

智利因實行多元民主較早，共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爲拉美歷史最悠久、人數最多之共黨，亦爲合法政黨，並曾加入「第三國際」，其與國際共黨合作頗爲密切。一九五二年在北平舉行之亞太地區和平會議，智利共黨及左派人士亦曾應邀與會，在該次會議上與中共建立初步關係。由是年中共「友好協會」隨即在智利成立，可以概見左派勢力在智利之活躍情形。智利左翼勢力之影響力可從一現象看出來，即當「新華社」記者在拉美各國紛紛因主張武裝革命而遭驅逐之際，其駐智人員卻未受波及。²¹

四、智利左翼「人民陣線」政府與中共關係

1. 建交之序幕

註¹⁸ 根據智利外交部雙邊政治司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之外交關係說帖，智利自一九一一年起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該關係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而告中止。亦即智利與中華民國維持近六十年之外交關係。依據中華民國外交部條約司民國八十年七月所編資料，中共於一九七一年元月五日止外交關係。

註¹⁹ 中共在中南美洲擴張之探討，台北，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民國七十七年，頁二十五及二十六。智利早於一九五二年即允中共設立「中（共）智友好協會」

註²⁰ 傳瑞即爲智利目前執政第一大黨基民黨現任主席傳雷（*Eduardo Frei Ruiz-Tagle*）之父，傳雷乃智利一九九三年大選總統候選人中呼聲最高者，有關傳瑞容共偏左背景，請參閱王建勛，認識中南美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初版，頁一九一至二〇三。

註²¹ 林亨能，「中共在拉丁美洲之擴張與政策」，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十期，民國七十六年七月，頁四十七。

智利與中共關係二十年（一九七〇—一九九〇）

中共在智利設立「友好協會」，及「商務辦事處」後，在智利的活動逐漸開展。亞力山卓（Jorge Allensandri）總統即曾公開表示智利有意與中共改善關係。其繼任者傅瑞總統上任後，為討好左翼政黨，決定容共偏左，適為中共提供更廣闊之活動空間。惟由於智利各界對中共尚欠缺瞭解，以及對其激烈革命手段尚有疑慮，故未進一步發展關係。迨阿燕德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上台後，上述關係才有決定性的轉變。^{②②}

阿燕德政府對外關係之政見之一為「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及加強關係」。而此適與中共在一九六九年所舉行之第九屆黨全代會中之決議「以務實及彈性之作法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間之關係」，相吻合。^{②③}阿燕德政府甫一上台立即與中共密商建立關係，其原因除了實現智利左派政黨長久以來的希望外，阿氏亦有利用政府甫成立，與國內各政治勢力尚處「蜜月期」階段，阻力較小之考量。於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智利駐法大使 Enríque Bernstein 奉命與中共駐法大使陳煥（Chen Huan，譯音）談判並達成協議建交。^{②④}智中（共）建交消息經披露後，我國駐智利李迪俊大使奉命代表政府向智利政府表達嚴正抗議後，並通知智利我國決定自一九七一年元月五日起中止與智利近六十年之外交關係，旋於當日搭機離智利。智利政府在本案上表現極大之彈性及外交技巧，因為智利外交部自始未提中止與我國之外交關係，而且李大使離智時，智利外長 Clodomiro Almeyda 尚且攜禮親赴機場送行。智利外交史學者曾謂智利政府有意同時承認我國及中共之圖似可想像。^{②⑤}惟中共始終堅持並獲智利政府同意「知悉」（toma nota de）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主張。也許此為不強迫智利政府主動與我國斷交之條件。

2. 初期雙方關係並不熱絡

阿燕德上台之初，中共仍對其抱持若干幻想，曾在人民日報上表達賀意，並稱阿燕德政府執政將為雙方關係建立新里程

註②③ Javier Eduardo Mata, "Chile y Republica Popular China",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Sigo., Chile) Año XXIV, Jul.~Sep. 1991, No. 95, pp. 347~348.

註②④ 同註②③。

註②⑤ 智利現政府文獻中所載承認中共之日期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詳見註②③；而我國政府認定智中（共）於一九七一年元月五日建立外交關係，兩者相差二十天。另引自註②④，頁三四九。

註②⑥ 智利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Joaquin Ferrnandis，認為當時倘我國不決定斷交撤館，智利政府可能會接受我國續與之維持正式關係。然而，衡諸當年時空，不但我國因與大多數拉美國家仍維持關係，必將作斷交決定，俾免「骨牌效應」；甚至中共是否能容忍「雙重承認」亦不無疑義。F教授看法見其書 Joaquin Ferrnandis, *Chile y el Mundo 1970~1973,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l Gobierno de la Unidad Popular y el Sistema Internacional*, (Sigo.: Univ. Católica, 1985), pp. 371, 380 y 381. 有關中共主張，雙方建交公報載明：“El gobierno chino reafirma que Taiwan es parte inalienable del territorio de la Republica Popular China. El gobierno chileno toma nota de esta declaracion del gobierno chino. El gobierno chileno reconoce al gobierno de la Republica Popular China como el único gobierno legal de China”。同本註。

碑。同時感謝智利於一九六九年曾投票支持其加入聯合國。此外，並派工人訪問團來智利參加阿燕德總統就職大典。²⁶

隨著雙方交往次第展開，中共與智利左派政府漸發現彼此同中有異，而且該差異不斷擴大。首先是奪權方式之別；中共當時仍堅信「武裝鬥爭」，故對蘇聯甚表激賞之智利「和平路線」嗤之以鼻。智利亦認為中共那一套不值得亦無法倣效。影響所及，智利聯合政府中僅社會黨若干領袖前往北平「取經」，其餘多數（智共、革命民主左派運動（MIR）及激進黨等）寧願赴莫斯科及古巴，亦不願前往北平訪問。²⁷此或係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發生後，中共使館僅予少數社會黨人士協助的原因之一。

總之，智利認為中共之革命模式不具吸引力；而中共則視智利左派政府領導之政治及社會轉變過於審慎，畏首畏尾，「不夠革命氣魄」（*poco revolucionario*），因此中共輒以老大哥的姿態予以「告誡」。惟結果不但未獲接受，反遭反感。

周恩來即曾警告赴訪之智利社會黨眾議員 Antonio Tavolari，表示「帝國主義正虎視眈眈；作好準備，武裝群眾吧！……軍隊雖算專業團體，但太保守；你們雖得了政權，卻尚未掌握權力。」²⁸周氏曾於一九七三年二月間，阿燕德政府垮台前半年復致函警告「蘇聯財經支援背後所隱藏之陰謀」。並提醒「將對某強權之依賴，轉變成對另一強權之依賴，算不得真革命」，並告誡應自食其力才能獨立自主。²⁹

3. 雙方之財經關係

由於前述之原因，使得雙方關係並不密切，除了智利坊間充斥毛語錄及中共免費奉送之大量革命書刊外，雙方在其他方面之合作似不積極。唯一較受矚目者為阿燕德之「告貸外交」。

阿燕德政府甫上台五個月即派經濟部長 Pedro Vuskovick 前往北平訪問，雙方簽訂「財政及技術合作協定」，中共提供六千二百萬美元貸款。當時智利國民年平均所得為七百美元，中共約為一百美元。儘管如此，智利仍認為該筆財政合作款項「不甚慷慨」。³⁰

註²⁶ 同註¹⁹，頁四十一及四十二。

註²⁷ 同註²⁵，頁三七二；智利左派各黨之政治傾向，請見 Edy Kaufman,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la Unidad Popular", *Foro Internacional* (México) Vol. XVII, Oct.-Dic. 1976, p. 269.

註²⁸ 註²²，頁三五四。

註²⁹ 王建勛，「中共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之演變」，問題與研究，第廿卷第四期，民國七十年元月十日，頁八十二；並請參閱註²⁵，頁三七二及三七三。

註³⁰ 見註²⁷，Edy Kaufman，頁二七〇及二七一；以及註²⁵，頁三八一。

一九七二年，智中（共）復簽訂四項經技合作協定，智利總統府計畫總署（Odeplan 為現計畫部（Mideplan）之前身）署長 Gonzalo Martner 曾對中共此項未附帶條件之長期貸款表示滿意。³¹但是當智利受到美國經濟制裁及國際金融機構抵制而捉襟見肘之際，中共則不願再予協助。尤其阿燕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赴莫斯科求援而未獲預期目標後，³²特遣親中共之 Almeyda 外長赴北平求援。周恩來告渠：「我們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我們同屬第三世界國家」，同時不忘批評智利對蘇聯之依賴，以及「勉勵」智利政府應「加強紀律、勇於犧牲，才能增加生產」。雖有中共因不滿智利不聽勸告，故意將原承諾九千餘萬美元不予兌現之說法，³³不過中共仍然提供智利數筆六千到八千萬美元之貸款。此外，並贈予大批豬肉罐頭。該批罐頭雖傳衛生欠佳，險釀反效果，惟中共節衣縮食配合拓展外交之作法可見一斑。³⁴

4. 中共對阿燕德政府遭政變推翻之反應

阿燕德執政後，對內以急進左傾政策推動國有化，經濟上則徵收外國（以美國資本之銅礦公司為主）企業，沒收私人工廠及土地，並拒予合理賠償。對外，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密切關係，而其呼籲拉美國家共組反帝陣線，更加激怒美國。其激烈改革措施，引起人民恐慌，更導致中間派基督民主黨，及右派以國家黨為主之反對黨的抗拒。社會漸呈浮動不安。以致示威遊行，繼而暴動暗殺頻生，加以經濟逐步走向崩潰，九月十一日陸海空警四軍接受多方敦請在「挽救經濟、社會及道德危機」之口號下，發動政變。阿燕德以卡斯楚所贈手槍自戕喪命。左派政府官員及其支持者四處走避，舉國陷入動亂。

政變爆發後，國際反應十分強烈，國際共黨即予譴責，歐洲各國多聲明表示遺憾。拉美多國為阿燕德之死致哀三日，其中墨西哥給予阿氏家屬政治庇護，阿根廷廿萬人示威高呼「支持智利，打倒美國佬」。³⁵

反觀中共之反應卻甚平淡。未有官方聲明，亦未見官方媒體報導。直到當月底英文北京周報才刊出一小段阿燕德遺孀在墨西哥接受訪問之報導。周恩來對阿燕德之唁電或許是中共唯一的官方反應。

在對智利左派人士求援時所持之態度上更可見中共之外交手段。當上述人士逃難前往中共「大使館」求救時，中共為避

註31 同註19，頁四十二。

註32 蘇聯鑒於阿燕德非共黨黨員，無意全力支持；加以智利政府中「革命民主左派運動」反對蘇聯模式。此外，蘇聯不願破壞與美和解，以及因援助古巴負擔已甚重等原因，對智利態度益形保留。詳見陳弘基，「蘇聯拉丁美洲政策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二年，頁六八及八十。

註33 見註29，頁八十三。

註34 該批豬肉經檢驗受旋毛蟲病(Trichinosis)感染，獲贈貧民不敢食用，丟棄不少。致智利迄今尚有中國豬(Chancho chino)之揶揄。有關貸款見註22，頁三五三；以及註25，頁三七二及三七三；另蘇聯援智情形，請閱註27，Eddy Kaufman, op. cit. 頁三六九及三七〇。

註35 王建勛，「阿燕德的垮台與智利政局」，中南美洲政治論叢，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頁四三六至四四八；另同作者，「智利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政局發展」，淡江學報，一九七三年，頁一九二至一九六；以及註32，陳弘基前揭論文，頁六十八至七十。

免觸怒智利軍方及省卻麻煩，概予拒絕，各種令彼等「心寒」的托詞齊現。³⁶當局勢較緩和後，中共決定間接透過民間提供智利社會黨（親北平）若干協助，對其他智共、革命民主左派黨、激進黨等，則仍予拒絕。由此可見中共之現實主義作法。

五、智利皮諾契軍政府與中共之關係

1. 中共在智利政變後之反應

中共在政變發生後，曾參考他國反應擺出姿態。中共駐智利「大使」（一九七三年四月呈遞國書）許春富（Hsu Chun Fu, 譯音）奉命離智利等候訓令。此亦顯示北平鑒於狀況不明，擬對智利局勢詳加評估。若干保守領導則傾向立即與智利軍政府斷交。³⁷嗣見智利四軍已控制局面，且更重要者為，軍政府宣佈與蘇聯、古巴及東歐國家斷交的決定直接影響中共之決定，中共大使旋回任所，雙方繼續外交關係。

2. 智中（共）維持關係之原因

「智利軍政府反蘇聯傾向」之判斷為直接促使中共決定與皮諾契政府繼續維持外交關係之原因。³⁸「敵人的敵人」值得利用。何況中共「利用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之策略似亦可解釋該項決定。此外，根據智利現任駐「美洲國家組織」大使 Heraldo Munoz 教授之看法，中共亟盼填補蘇聯留下之政治空間，以擴大其在拉美之勢力，以及在國際間打擊我國，此皆為其願與智利軍政府繼續維持外交關係之原因。³⁹

對智利而言，政變後國際譴責捷伐之聲四起，以及隨後東西方列強之杯葛、抵制及禁運，為免在國際間陷入極度困境，亦需國際強權給予支持。中共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未予嚴厲批評者。尤其一九七四年起聯合國大會開始投票決定是否譴責智利軍政府違反人權，十數年間，中共先以不與會，次以棄權，間接表示對皮諾契之支持。尤以在國際間以

³⁶ 據智利社會黨現任某負責國際關係幹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三日告稱：中共「使館」當初告渠等，中國經歷數代，人民革命才得以成功，智利還需要再等。

又當時中共在「使館」大門貼出「革命者永不尋求政治庇護」西文字報（Los revolucionarios nunca piden asilo politico），另據激進黨現任某高級幹部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卅一日告稱，該黨當時有鑒於中共作為，曾飭黨員勿「求辱」。另見 Wolfgang Decker, "Latin America: How the Chinese See the Region", i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 No. 3, 1989, p. 247.

³⁷ 同註³⁶，頁三三五。

³⁸ 同註³⁷。

³⁹ Heraldo Munoz, *Las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l Gobierno Militar Chileno*. (Sigo. Ed.: Ornitorrino, 1986), p. 230. 另據未經證實之說明，智利軍政府曾要求若干鉅額援助做為與中華民國政府復交之條件，未果，本案胎死。反觀中共為討好軍政府隨即承諾將原貸予阿燕德而尚未動用之款允諾悉數交予皮諾契。此外，提供蘇聯及古巴密藏供應左派民兵之軍火庫地點，智利軍隊聞訊聞至一舉成擒，自此對中共增一份信任。

親中共聞名之阿爾巴尼亞共黨政府亦追隨北平之作法，^{④0}令智利軍政府感激不已。

此外，與中共維持關係適可印證其「願與全世界尊重智利主權及其獨立自主的國家維持關係，不論其意識形態為何」之宣示。另者，智利軍政府為紓解歐美抵制之困，強調「亞太地區乃智利發展政經及戰略關係之最接近且最自然的空間」。再者，智利懷於外界之敵意，為保障其自身安全，有意將中共勢力引進，以取得其與阿根廷對於南部疆土之爭執中的優勢。在此背景下，中共之勢力進入智利，亦有利其向南極發展。^{④1}

一九七三年智利政變前一個月中共舉行第十屆全代會，決議「加強在拉丁美洲對抗蘇聯之擴張主義」。一九七四年，中共「三個世界論」推出，引起相當迴響。適逢拉美當時民族主義逐漸抬頭，盼擺脫美國控制追求獨立自主外交。中共既反「美帝」，亦反「蘇霸」之論調，甚合拉美口味。尤其中共不斷凸顯其屬「第三世界」之色彩，願在國際經濟新秩序、發展民族獨立經濟、非核、外債，甚至中南美國家主張之「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等各方面予以有力支持，因此甚得拉美之讚賞，而願與之進行合作。

尤其周恩來「追求共同點，擱棄相異處」以進行合作之說詞漸生效。一九七七年起，智利軍政府終於改變其對中共之冷淡態度，決定與之加強合作關係。自此雙方不斷強調其「同屬第三世界，應追求共同利益，摒棄歧見。」^{④2}

3. 雙方政要互訪情形

一九七七年以前，智利與中共雙方之互訪極少。直到是年智利態度轉變，次年派其外長古必友（Hernan Cubillo）訪中共，拜會「外長」黃華及重要首腦。此後雙方互訪漸密。

一九七九年，智利經濟部長 Roberto Kelly 及外交部次長 Roberto Soto 分別訪問中共。一九八〇年，智利農長率團訪中共，並簽署數項合作協定。

一九七八年起，每年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辦之混合合作會議多由雙方次長級官員率團參加。一九八四年，智利新外長德巴耶（Jaime del Valle）率領外交部官員及企業界人士赴中共訪問，曾會見趙紫陽及吳學謙等人。^{④3}一九八五年，中共派國務院委員康世恩（Kang Shien，譯音）答訪，是為歷年中共訪智利職位最高者。

註④0 同註②，頁一九一至一九九；另世界各國投票情形見頁三〇九至三二五附圖。

註④1 同註②，頁三五六及三五七，以及註②，頁三三〇及三三一。

註④2 Emilio Ruiz-Tagle,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 de China", in *Anales de Diplomacia 1973-1983* (Sgo.: Ministerio de RR. EE., Ed. Universitaria 1984), p. 125. 另同註②，頁五十。

註④3 同註②，頁三三〇至三三五。

一九八六年，為慶祝智中（共）建交十五週年，智利籌組由政、軍、工商、文化及體育領袖組成之一百三十人龐大訪問團，由外交部副部長（該職率由軍人擔任，次長則由職業外交官擔任）率團。是乃智利歷年外訪最大代表團，^④智利對中共之興趣可以概見。

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雙方互訪達到高潮。智利能源部長、經濟部長、總統府計畫總署副總署長；中共外次、電力工業部次長、外貿部長等高級官員曾分別互訪。此種互訪之頻繁，階層之高，在有邦交國家間亦屬罕見，充份顯示彼此關係之密切。皮諾契執政最後一年，雙方亦有中共核能委員會主席訪智利，以及智利外次率團訪中共。此外，中共派遣之綜藝團、學者訪問團及體育團亦絡繹於途。^⑤

4. 智中（共）經貿、文化及科技關係

智中（共）為加強合作，雙方自一九七八年起設立「兩國年度合作混合委員會」，於軍政府時期每年舉行。通常在會議中討論彼此關切之重大合作議題。如一九八二年之會議討論中共對智利順差及雙方共同利用智北自由貿易區及大陸經濟特區進行貿易等案。一九八三年，則涵蓋科技合作項目。^⑥

貿易合作方面，因中共之擴大採購，智利成爲其在拉美最重要夥伴之一。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七年間成長百分之三十一。中共成爲智利全球第十五大貿易夥伴。^⑦尤其自一九八四年起，中共開始售給智利原油，一九八七年中共原油占智利進口原油百分之五十八點八，成爲中共銷智利最重要項目，是年占其對智利總出口百分之九。中共銷智利產品呈多樣化，項目超過四十種，而智利輸往中共之產品則集中在銅、硝石、魚粉、木材及紙漿等。^⑧

在經濟合作方面，最引人注意者爲雙方國營公司合作之銅管工廠在北平設立。智利國營銅礦公司與中共北京金屬工業公司合資經營，進行技術合作，該「北京—聖地牙哥銅管公司」爲中共與拉美國家同類合作之首例。^⑨

註④ Heraldo Munoz, "Chile, Autoritarismo y Política Exterior", in H. Munoz, (ed.) *Anuario de Política Exterior Latinoamericana*, (Buenos Aires: Ed.,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7), p. 450.

註⑤ H. Munoz, "Política Exterior de Chile en el ano del Plebiscito" en H. Munoz (ed.) *A la espera de una nueva etapa*, *Anuario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Latinoamericana 1988-1989*, (Caracas: Ed., Nueva Sociedad, 1989), p. 257-258 and H. Munoz y Daniel Asenjo, in *Anuario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Latinoamericana 1989-1990*, (Caracas: Ed. Nueva Sociedad, 1990), p. 296.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同註⑤，頁三六一至三六三。

註⑧ Rafael Aldunate U. "Relaciones Economicas de Chile con la Republica Popular China", in Sergio Valdivieso y Eduardo Gavés C., *Chile en la Cuenca del Pacifico*, (Stgo.: Ed. Andrés Bello, 1989), pp. 142-143.

註⑨ 同註⑤ - H. Munoz y D. Asenjo, *op. cit.*, p. 296.

一九八〇年代，雙方合作擴至科技、文化及體育。一九八四年，智利德巴耶外長訪中共時，雙方曾討論科技轉移及合資經營事宜。訪問期間並敲定向中共購買七具水力發電機。⁵⁰

文化交流方面，由於係中共最初用以拓展其與拉美關係之利器，因此自是充份利用。一九八一年，雙方簽訂文化體育協定，決定互派學者專家訪問及舉辦文化展，兩年後續簽，自後每兩年簽訂乙次。迄今尚在進行。惟成效似不彰顯。⁵¹

5. 雙方在南極之合作

中共鑒於列強多在南極建立據點，亟思跟進。一九七七年起開始與智利接觸，蒐集相關資料。次年，智利適與阿根廷為南部畢格雷海峽 (el Canal Beagle) 主權引發爭端，⁵²劍拔弩張，幾釀成本世紀拉美最大型戰爭。智利外長古必友啣命全程處理談判事宜。是年，古必友訪中共，主動提出雙方共同進行南極科學研究之議，⁵³其理由可以想見。一九七九年，智利經長訪中共，本合作案遂正式敲定。

一九八一年，中共「國家南極地形委員會」，表示有意在南極設立研究站。「智利國家南極研究所」(INACH)遂奉命予以力助。其主要方式為接納中共所派科學家在智利基地內進行氣象及資源回收研究。

經智利數年之協助及合作，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中共「長城」(Gran Muralla)基地終在南極設立，其內可容納十五名研究人員。為表對智利感謝，中共特派人代會常委武衡(Wu Heng)赴智利主持啟用典禮。典禮中武氏代表中共向智利國防部長表示感謝。⁵⁴

雙方南極合作之動機，除前述外，尚可歸納為：

- (1) 中共贊成南極維持現狀 (status quo)，對智利有利。
- (2) 中共進入南極後，五核子強權可在該地維持均勢。
- (3) 智利感謝中共在國際間，尤以在聯合國之支持。更重要者為回饋對一九七八年智阿衝突時之力助誠意。⁵⁵

註50 同註39，頁二二三及二三四。

註51 據悉，學術交流計畫原由國立智利大學(Universidad de Chile)承辦與中共學術機構互派教授及留學生進行研究及教學。惟因中共所派人員或因獎學金過少，須在智利打工，或因嚮往自由，期滿不願返大陸，造成許多問題，故交流成效欠佳。甚至還曾造成一名中共交換學生在智利自殺慘劇。自一九九一年起已另委私立「太平洋大學」(Univ. del Pacifico)接辦。

註52 智阿談判經過見「La Tragedia Evitada」in *Ouè Paso*, No. 1033, 28-Enero-1991, pp. 12~18.

註53 同註39，頁二二六。

註54 同註53。

註55 據智利天主教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孟能思(E. Meneses)博士(牛津大學)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告稱，當時蘇聯曾密允協助阿軍政府。中共則向智利政府表示「一旦戰事爆發，智銅產品銷售有困難時，中共願全數收購。」該安定力量可以想見。

(4) 引進亞洲強權以打擊馬來西亞「南極國際化」之主張。⁵⁶

6. 雙方「務實主義」之實踐——不干涉內政

皮諾契軍政府為抗拒外界壓力，一再援引「不干涉內政」之原則，而此適正乃中共「和平共存五原則」之一。雙方遂在此藉口下彼此聲援。

一九八八年，中共對拉美之宣傳刊物北京報導（*Beijing Informa*）評選是年智利全民複決為全球十大新聞之一。惟當智利記者就前述採訪中共駐智「大使」黃世康之看法時，黃氏十分技巧地答以：「我不習慣干涉他國內部事務，但我深信智利人民有決定其政治前途的能力」。⁵⁷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發生之際，智利政府亦展現其「務實作法」。當舉世紛紛對中共撻伐，甚至智利大學生亦紛紛要求智利政府向中共提出抗議之際，智利外交部除約見中共「大使」，要求提供資料外，別無動作。嗣智利外長Hernan Errazuriz答覆記者稱：智利政府沒興趣亦不意圖影響「中國」情勢之演變，願充份尊重「中國」政府及人民之最終決定。此雖或有其他考量，⁵⁸惟不願因抨擊中共而影響與其關係之顧慮畢現。

是年十月，中共「外長」錢其琛公開宣稱：「由於智利同我國彼此尊重對方主權，並實踐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因此兩國間維持目前極友好的關係」。⁵⁹

六、結 論

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由於中華民國仍與智利維持邦交之事實，美國之態度、蘇聯之影響力，以及智利左派之疑慮等原因致使中共與智利關係相當疏遠。

然而中共利用「文化外交」，於一九五二年在智利設立「中（共）智友好協會」，一九六一年復發動「經貿攻勢」，建立「商務代表團」，終逐步累積其與智利各界關係。

註56 同註22，頁三六二及三六三；及註39，頁三三三。

註57 同註45-H. Munoz, *A la espera de una nueva etapa, Anuario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Latinoamericana*, op. cit., p. 287.

註58 據孟能思教授同日告稱：當北平局勢陷入混亂，各國紛紛撤館時，智利駐中共大使奉命向北平政府表示，智政府將不撤館，以示對其支持。嗣局勢穩定，北平曾表感謝。智大使答以：「一九七八年的人情債，今已告還清」。（*La deuda de 1978 ya está saldada*）。事實上，智利政府在天安門事件上對中共之支持，未嘗不可視之為回報中共過去在聯合國對其解困之恩。由此亦可看出雙方關係一度深固的程度。以及智利對外關係之特質。

註59 同註45-H. Munoz y D. Asenjo, op. cit., p. 296.

阿燕德左派政府上台提供中共與智利建立正式關係之良機。雙方關係之建立意味中華民國退出競爭，另闢戰場，使智利政府可能有意進行之「雙重承認」構想落空。中共使智利政府承諾其「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設計，自此使我國與智利關係硬被套上桎梏，受到極大限制及不便。

中共給予阿燕德政府若干支持，惟雙方因「革命本質」不同，互不欣賞；且所進行之「革命手段」相異，因之，關係並不熱絡。雙方之主要關係僅限於中共對智利之貸款及援贈。阿燕德逝世時，中共僅以一則電報致意，可見中共之態度。

皮諾契政府上台後，中共對其原存保留立場，嗣見其主要敵人蘇聯退出智利，見機不可失，遂利用「次要敵人」共同打擊主要敵人。為達此目的，中共幾乎使出一切可使用之手段，包括冒天下之大不韙，支持極右派「法西斯軍事政權」。中共與智利維持關係尚有打擊我國國際地位，在拉美擴張以及將勢力伸展至南極的目的。

由雙方關係之密切可以看出彼此努力追求合作目標之強烈意圖。互訪之頻繁，經貿、科技及文化體育，甚至在南極上合作之密切，彼此之提攜，均乃一般邦交國罕見，何況兩者距離遙遠，意識形態甚且南轅北轍，能發展出如此程度之關係實乃冷戰時期國際關係之異數。雙方在外交上「務實主義」(pragmatism)及彈性(flexibility)之實踐可說是其雙邊關係之特點。

綜觀過去二十年來智中(共)關係，可約略歸納智利外交之若干特徵。其一為崇法。智利尊重法律雖有其時代背景及歷史需要，但已成爲其外交之特色。簡言之，為尊重國際法原則及遵守國際約定(包括仲裁結果)。其二為現實主義，以追求其國家最高利益爲鵠的。何者能提供其政治、戰略或經貿利益，即乃其追求發展關係的國家。其三爲靈活及彈性，智利文化水準頗高，外交人員素質甚佳，軍政府時期飽受國際孤立，仍得以各種可用途徑及方法拓展外交，爭取國家利益，並獲相當成功可爲證。

智利文人政府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上台後，國際孤立頓除，國際聲望日隆，地位陡昇。相對地，智利政府對中共之倚賴已大幅減低，易言之，中共不復爲其最重要之友邦，類似過去二政府間密切之合作關係雖不無可能重現，惟可能性頗低。

不過，智利仍視中共爲一國際間重要強權，尤其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角色將漸凸顯，中共以其受矚目之國際地位，仍受智利政府重視及倚重，尤其在智利政府「恢復過去歷史上在國際間之光榮地位」的對外關係目標上，智中(共)關係仍將繼續發展。

*

*

*